

批评的多元化与“文化诗学”

黎 风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文化诗学”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出现并在80年代正式亮相的研究思潮,近一两年来引起了中国批评界的极大关注。其实从古希腊时代起西方文论就有很浓的文化互渗倾向,经历了“文化——文学——文化”的轮回历史过程。现代“文化诗学”是在社会科技知识理性和批评多元化的新背景下形成的,文学批评更多地关注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运行机制和民间生态文化等问题,具有更强的文化批判性和思想沉思能力。

关键词:批评;“文化诗学”;多元化;民间性;政治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3-0056-06

20世纪后半期的高科技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引起了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在内的社会意识文化形态存在方式的重大变革,而技术理性的流行使人们的知识选择脱离了原有的人文主导的轨迹,呈现出务实求用的科学主义的社会文化倾向。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精神文化选择更多地偏向于影视、广告、畅销书、快餐杂志、英特网等大众传播方面,传统的文学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人们对文学的精神依赖性日益减弱,出现了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全球性危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文学审美精神被解构和泛化的同时,文学批评也在生存形态上日益边缘化和多元化,渗入了政治批评、社会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语言批评等多种因素,批评的文本对象呈非文学性的趋势。在法兰克福学派开展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同时,巴赫金在西方文论界开创了“文化诗学”的研究方式,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前些时候,童庆炳[1]、程正民[2]、陈太胜[3]、李春青[4]等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化诗学”的文章,探讨如何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深入中国古代文

论、中国现代诗学、小说诗性和文学存在研究等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一个新动向,值得我们关注和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 一般诗学批评与“文化诗学”

不用作任何掩饰和辩解,所谓“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直接来源于西方当代文论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资源,这种批评方法和思潮的兴起说明了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发生着潜在的、也是结构性的巨大变化。只要一提到“诗学”二字,如果不是出于强烈的、也可能是狭隘的文学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古希腊审美学统和亚里士多德,那个宏柱玉阶下醉卧狂辩的“逍遥时代”经过欧洲中心论者朝觐般的放大和宣扬,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精神灿烂和辉煌,穿透两千余年西方批评学术的研究历史而照亮当代诗学研究领域,“诗学”(poetics)规定了批评的西方化最高学术原则和理论精神。

除去黑格尔、康德等历史大师不说,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古希腊精神依然是批评理论频频回首的所在。迈纳在其新著《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中虽然宽容地承认中国的

收稿日期:2002-10-21

作者简介:黎风(1956—),男,广西玉林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比较诗学”在职博士研究生。

《诗大序》和日本的《古今集》等东方批评著作具有“原创性”(originative),指出:“在其各自的文化体系中,这些著作同样具有原创性,正如亚里士多德诗学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具有原创性一样。但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受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支配,这些著作才似乎不怎么具有原创性,不怎么像一种诗学理论。”[5](18—19页)但在解释“诗学”概念构成和“经典性”特征时,迈纳依然是把亚里士多德诗学看成最具学术规范的正宗,是以这种标准来吸纳或解构东方等非西方的批评元素,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使我们能够把这个词定义为对被看作自律主体的文学(他指的戏剧)的性质和实践所作的描述。……《诗学》是不同文化体系出现的诗学(我们刚才称之为原创性诗学,originative poetics)中最为持久、最富生命力者。……亚里士多德着手描述了什么是文学,并界定了文学的构成成分,展示了文学的手段和目的。”[5](16—17页)在反复确认了戏剧、抒情诗等“基础文类”对诗学批评的对象价值和原发条件后,迈纳很坦率地将这一长期模糊的概念简明地概括为“‘诗学’可以定义为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5](3页)。

很显然,迈纳对诗学批评的看法代表了当代西方文论界中一部分持传统保守思想人士的诗学立场,“诗学”必须以文学为基本研究对象,要以具体的作家诗人、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主要的批评文本(text),虽然可能涉及文学背景的具体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宗教、艺术、文化、民族性、习俗等意识形态和经济生产制度,以及科学技术文明等,但“诗学”的本质只能是文学理论与批评,而不是批评对象和内容的泛社会化、泛文化性,自然也就不存在“文化”与“诗学”嫁接的所谓“文化诗学”。

就批评诗学的学科历史和知识谱系而言,迈纳之类的文学批评诗学观是有学术根据和有道理的,但如果死守批评诗学与文学的对应关系,过于强调“诗学”的文学性而不注意批评的历史内容变化和社会文化结构对批评的新元素植入,则未免有些机械狭隘。批评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知识置换和过滤的历史过程,进入数理科学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尤其是这样。

依我所见,一般诗学批评不仅与文学相关,当然也与某个时代文化思潮相关,而且后者是批评展开的前提和最终目的,主要理由有三。

1)意识形态的杂合性。虽然社会科学对政治、法律、宗教、艺术、文学等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质和特点作了相当严格清晰的界定,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是交叉混合的,精神思想既可能反映为一种学科界限模糊的著作文本,如西方《圣经》、《福音书》、《波斯人札记》和中国的《尚书》、《史记》、《水经注》等,而更多的却是只呈现(存活)于当时的文化潮流和人生现象。

2)纯文学的虚妄性。长期以来文学都有一种独霸语言文字审美权力的倾向,并用“抒情性”、“形象化”、“叙事性”或“前符号”等特点来区别文学与其它文化形态,其实文学的审美特性只存在于与自然、社会和人的文化关系之中。即便文学完全退回到纯语言和纯文字的层面,它的美感依然取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如马克思所言的“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6](97页)。

3)批评目的的多样性。就西方古希腊时代和中国先秦诸子阶段来看,东西方早期批评学说和理论雏形都有文史哲医等多科融合不清的特点,重点探讨的是自然构成、自然法则、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伦行为的形而上学问题,作为情感表现和精神娱乐的文学只是批评的旁类,以后的文学批评也有“借船过河”的功利主义传统,其目的指向社会政治、宗教习俗、文化风尚和道德行为,偏偏不能在引导创作这一重要职责上发挥作用。

正因为批评长期蕴涵的文化价值以及与哲学分析的相似性,我认为卡西尔对哲学的文化综合功能的一段总结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很有启发性,他说:“在神话想象、宗教信条、语言形式、艺术作品的无限复杂化和多样化现象之中,哲学思维揭示出所有这些创造物据以联结在一起的一种普遍功能的统一性。神话、宗教、艺术、语言,甚至科学,现在都被看成是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而哲学的任务正是要使这种主旋律成为听得出的和听得懂的。”[7](91页)如果哲学可以面对一个复杂构成的历史文化世界,而批评当然也可以穿越文学的外壳而进入社会文化的深处,在文学“主旋律”中听出饱含各种文化成分的“众多变奏”。

二 “文化研究”意味的西方诗学历史考察

从更深久的学术传统来看,古希腊时代的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文化研究的色彩,这本

身就是当时哲思虚玄之风盛行、热衷于数理科学思维的文化风尚所决定的。严格地说来,亚里士多德只是以一本《诗学》享有诗学批评学科的原初命名权,他并不是西方诗学批评研究的第一人,向前推溯还有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品达、赫拉克利特等,而我以为德谟克利特才是学术意义上西方诗学批评的真正的奠基者。

在《论诗的美》中,德谟克利特就从物理科学的知识背景,论证和发展了赫拉克利特关于文艺是对自然摹仿的学说。他对荷马之类的“天才”般创作的评价除了来自于最早的宗教信仰,也是关于社会伦理的道德准则、处世行为的文学理想。这些断断续续的残篇短句包涵着古希腊人当时对自然、科学、宗教、教育、伦理、艺术等精神领域最朴素的文化观念,他对荷马史诗的论说(谈不上研究)不过是介入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入口处。显然,德谟克利特的文学批评在一般的学术意义上都谈不上纯粹,“杂”的特点是与其学术知识背景的“杂”直接相关的,这个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古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8](3页),在研究哲学、物理、伦理学、数学、文学、艺术学方面的造诣颇为精深,其著作涵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门类的52个学科,显示了关注社会问题的兴趣远远大于探讨纯文学问题的古希腊学术风尚。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现代“文化诗学”最初的古典渊数和最古老的历史文本。

毫无疑问,在西方文化体系和诗学理论研究中亚里士多德是必须关注的最重要的人物,一部残缺不全的《诗学》成了西方文艺理论最具权威性的“法典”,获得了历代学者的推崇和极高的评价,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认为《诗学》“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9](23页)不可否认,《诗学》在文学的本体论、风格论和体裁论等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主要讨论悲剧、史诗和喜剧,也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诗的起源、诗的分类、诗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等问题,提出了“净化论”,发展了“摹仿说”,这些都是关于西方古典文论的基本常识,没有必要为了替“文化诗学”寻根而刻意否认《诗学》所具有的文学批评性质。

但是,与德谟克利特的学术经历相似,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个文理精通、“最博学的人”(恩格斯语),他不仅在形而上学、物理学、政治学、伦理学、文艺

学、美学六大方面著作宏富,而且还领导主编过许多动物学、医学、天文学、形而上学、物理学、数学、植物学、化学等学科的书籍。渊博的学识和强烈的社会现实参与意识造就了亚里士多德学术研究的综合倾向和文化品格: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文理并举,多学科渗透交叉,体现当时人类知识的丰富性和系统性。如果注意到古希腊学术的这种特点,按我们对“文化诗学”指涉范围的粗浅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批评当然不限于《诗学》一隅,还应该包括《心灵论》和汲取了《修辞学》、《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失传的《论修词》、《论诗人》、《戏剧研究》、《荷马问题》等著作,涉及到文学与社会文化、文艺活动的心理、音乐等艺术形式的政治作用、语言的社会性与写作运用、社会道德与文化习俗、科学研究与宗教信仰等许多问题,构建了一个庞大驳杂的思想文化体系,比单纯的文学研究更具有文化研究的色彩。

因此,正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诗学》只进行美学关照一样,其它学科的后来者也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成果各取所需,如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是从“净化说”中寻找“升华”和“自我实现”的心理学依据,马伯拉罕、马林诺夫斯基则看重亚里士多德的阶级社会学观点,黑格尔、康德、笛卡尔又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获得了哲学启发。可以说,两千多年以来的西方思想文化界都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体系中汲取了不同的学术资源和养分。

在谈到西方诗学批评史的轮廓时,迈纳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向后拉了一条粗略的线索,并揭示了这一漫长过程中的研究特点和变化的必然趋势,他说:“人们轻而易举便可列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诗学理论。比较全面的西方体系有从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到明图尔诺(Minturno)、维达(Vida)、朱利乌斯·凯撒·斯卡利格(Julius Caesar Scdliger)及至锡德尼和霍布斯。此后——又从高乃依、勒·博苏(Le Bossu)到德莱顿(John Dryden)——越来越呈现出下面这样一种情形,即某一诗学理论公开承认自己是不全面的,是一种单就某一部戏剧的研究,是一篇关于戏剧诗文的随笔。将诗学范围窄化,部分是由于精益求精(并不一定等同于洞察)和变化了的文学社会机构化所致,在这一变化中,一般的批评家让位于更具专长和更适合时代需要的文人们。”[5](4页)迈纳虽然没有明说“诗学范围窄化”的历史变化

是由于文学的成熟和地位上升而导致了文化研究倾向弱化和文学批评的更加专业化,但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以前的确是批评学科的显象和主流。

此后,尤其是从 20 世纪的 20 年代、30 年代起,西方文学理论与诗学批评则在世界政治意识形态多极化和科技文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又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受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的影响,文论与批评也出现了非理性和语言学的两大转向,研究的重心明显朝作品文本和公共受众倾斜,这就势必涉及到对整个社会的人生处境和文化体系进行评价的问题。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萨特的人道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的“诗意”哲学、巴赫金的狂欢诗学,到德里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西苏的“躯体写作”、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改造、怀特的诗性元历史、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西方的诗学研究越来越远离文学本体和创作的具体问题而脱离了古典主义诗学的轨道,越来越具有社会宏大批评的文化研究意味,完成了西方诗学研究从“文化——文学——文化”的一次螺旋式复归和上升。

三 “文化诗学”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构想

尽管 20 世纪欧美和东方的中国、日本、印度的文学理论与批评都有文化诗学的成分,但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巴赫金无疑是“文化诗学”研究的首创者。

早在 20 年代,巴赫金就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等著作中表现了文化诗学的思想。他认为,文学是与具体历史时期一切文化形态紧密关连的社会审美文化现象,文学研究和批评要内外结合,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风俗、民间生活细节等多种社会文化层面来解读作品文本,所谓的文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以文学为主的社会文化问题研究。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在 60 年代走向了成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和《拉伯雷的创作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1965)等论著中,巴赫金提出了“复调小说”、“狂欢化”等问题,建立了以“对话原则”为基点的文化诗学,从文学经典的重新解读中突破传统诗学的封闭性限囿,走向了完全开放性的社会民间文化的广阔空间。

对于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诗学”研究,晚年的巴

赫金在 70 年代《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谈到了自己理论的初衷,强调文学与文化的联系和同质异构性,把文化视为文学与社会经济体系联系的中介,重视不同文化形态相互影响、依存和交叉融合,主张从“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和“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潮流)”[10](363—366 页)。虽然巴赫金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诗学”的概念,但他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东西方后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的整体性“文化转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真正在理论界打出“文化诗学”旗号是 20 世纪 80 年代正式亮相的“新历史主义”。1982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格林布拉特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首次用了“新历史主义”的说法。他还主编了《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丛书》,明确了“文化诗学”这个概念在文学理论中的学术合法性。这套“文化诗学丛书”集合了蒙塔鲁斯、戈德堡、奥格尔、特伦豪斯、佛格逊、多利莫尔、蒙托斯、怀特等人,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阵营雄厚的“文化诗学”研究群体,格林布拉特则在大学专门开设“文化诗学”的课程,是该派的理论代表和领袖人物。

格林布拉特和怀特等人的“文化诗学”理论总体上主张进行跨越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界限的“跨学科研究”,用多维的文化视野来研究文学和亚文学现象,并且强调文学与文化的社会政治批判思考的内涵和价值,通过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从意识形态、公众心理、政治权力、文化多元等方面进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历史的社会批判,沿着历史“语言化”的具体方式走进文学历史与社会政治的真正存在。

显然,“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现代主义文论一样,重视文学与文化的当代意义和社会针对性,但“新历史主义”更重视历史化的文学本文与政治或权力之间的关系,所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史在本质上不过是政治体制和权力势力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种种文化表现。因此,多利莫尔才认为:“非支配性因素同种种支配性形式形成相互作用,时而相互共存,时而又被吸收或者甚至被毁灭。但是,非支配性因素也向种种支配性形式发出挑战,使之被修正,甚至被移位。文化并不

是按照任何想象力乃至文学想象力的放纵所期望的那种统一体。”[11](6页)

近一两年来,“文化诗学”悄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解读李白、杜甫诗歌,探讨“非非主义”,重评朱光潜、钟敬文学术品格等,试图从“文化诗学”的新角度重现盘活几千年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资源,“文化诗学”甚至成为某些大学的专业课程和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其实它本身就是中国新时期文论长期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进行转口输入的一种自然惯性和社会文化现象。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我以为“文化诗学”于世纪之交在中国登陆是与以下一些文学、文化和社会历史语境有关。

1)文学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下滑,已经丧失了精神情感层面传统的主导优势和权威性,不再具有经典对象的阐述意义和唯一性。

2)新时期文学从“十七年”和“文革”的政治官方文学走向了普遍性的民间自我,民族历史文化和民间生态文化成为文学文本的叙述对象和隐形构架,文学创作出现了“非文学”和“反文学”的边缘文化倾向。

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商品经济制度的形成,使文学由个人精神行为演变为“广场文化”的社会化过程,文学活动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个体化的审美活动,创作、阅读、欣赏的相互刺激导致了文学的批量化、系列化生产,形成了消费性的社会生产机制。

4)现代电子技术加速了中国的影视大众传播文化的进程,作家活动和文本生成都有强烈的“影视化”等运作性极强的因素,文学的精英意识已普遍为影视副本的创作潜意识所替代,文学创作与接受在大众传播文化的背景下已由人际传播转变为一种影视化的大众传播,热播影视作品与配套文学书籍的热销成为时下最具互文效应的文化景观。

5)批评的多元化和现实社会的干预性淡化了纯文学的研究倾向,“媒介批评”、“文化批评”、“民谣批评”、“快餐批评”彻底解构了以往文学批评文本的学究气息和宏大模式,批评话题和话语具有泛文化的特点和社会政治针对性,如“人文精神”、“精英意识”、“跨文化”、“异质性”、“失语症”、“知识分子立场”、“民间化”等问题都有社会批判、道德批判、审美批判和政治批判相互渗透交叉的学术倾向。

“文化诗学”研究在中国批评界刚刚才兴起,如何使这种西式的批评方法与中国的具体文学现实和社会文化形态有机的结合尚处在探讨摸索之中,鉴于西方诸多现代批评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化”教训,“文化诗学”在中国的前景和命运还很难预料。我的基本想法是中国式的“文化诗学”必须反映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论原型、话语概念方式、思维能力与特征以及中国的现实文学性文化问题,上述5点既是导致“文化诗学”批评的中国式背景,同时也自然是中国式“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当务之急,中国式的“文化诗学”应该三个面向:面向与文学相关的社会文化“现场文本”,解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阐释和心理描述的问题;面向联系古老历史与鲜活现实的“过程文本”,梳理中国当代文化知识的历史谱系和现世呈现;面向与文学相关的各种“互文文本”,从古迹、民俗、历史事件、地域文化、方言俚语、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态来考察文学生成的复杂性,研究文学与其它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多样性和整合性。

21世纪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使中国的理论批评界涌动着温暖的诗意和学术创新的无限激情,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文化诗学”也许在几年后会成为一种美丽而感伤的回忆,但人类精神远征的长旅正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的理论牺牲和前识埋葬中向前延伸。

注释:

[1]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J].文学评论,2001,(6).

[2]程正民.小说特性和民间文化[J].文学评论,2001,(6).

[3]陈大胜.走向文化诗学的中国现代诗学[J].文学评论,2001,(6).

[4]李春青.文化诗学视野中古代文论研究[J].文学评论,2001,(6).

[5]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6]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7]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8] 德谟克利特. 论诗的美[M]. 西方文论选:上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 [9] 转引自:杨荫隆(编). 西方文论家手册[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
- [10] 巴赫金. 答《新世界》编辑部问[A]. 巴赫金全集:第 4 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11] J·多利莫尔. 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A]. 政治性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新论[M]. 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5.

Multi-Element of Criticism and “Cultural Poetics”

LI Fe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poetics” emerges in the criticism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akes a formal position in the 1980’s, which catches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criticism circle in the recent two years. It goes through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mutual cultural permeation from culture to literature to culture since ancient Greek. Modern “cultural poetics” takes shape in the background of rationality of social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multi-element of criticism, gives more attention to the issues of political ideology, economic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opular ecological culture i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s of stronger cultural criticism and meditation.

Key words: criticism; “cultural poetics”; multi-element; folkloric nature; political ideology

[责任编辑:张思武]